

中山大学·公民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ICS)主办

公共生活评论

主编 朱健刚

PUBLIC
LIFE REVIEW

第一辑

社区、空间与行动 COMMUNITY, SPACE AND ACTION

- 张 鹏 / 社会转型时期中国的空间现代性争议
- 朱健刚 王 超 / 集体行动的策略与文化框架的建构
- 孙湛宁 / 加码的逻辑

中山大学·公民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ICS）主办

公共生活评论

PUBLIC LIFE REVIEW

第一辑

COMMUNITY, SPACE AND ACTION

社区、空间与行动

■ 主编 朱健刚

■ 张 鹏 / 社会转型时期中国的空间现代性争议

■ 朱健刚 王 超 / 集体行动的策略与文化框架的建构

■ 孙湛宁 / 加码的逻辑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公共生活评论(第一辑)/朱健刚主编.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0. 1

ISBN 978-7-5004-8448-6

I. ①公… II. ①朱… III. ①社区—生活—研究—中国 IV. ①D669. 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240606 号

责任编辑 陈 彪
特约编辑 李登贵等
责任校对 韩天炜等
封面设计 张建军
技术编辑 戴 宽

出版发行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电 话 010—84029450(邮购)

网 址 <http://www.csspw.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金瀑印刷有限公司

装 订 广增装订厂

版 次 2010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0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1000 1/16

印 张 15

插 页 2

字 数 230 千字

定 价 25.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卷首语

2010 年春天,《公共生活评论》悄然呈现在您的面前。

这是由中山大学公民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ICS)主办的一本致力于推动行动研究的跨学科学术刊物。它力图在中国开拓公共社会学与行动人类学的领域,它也希望学术研究能够基于公民的立场,关注社会的转型,推动公民社会的健康发育,实现社会的和谐与公正。

探索关于社会发展的客观理性知识以及实现对于社会公正的价值追求,是这本刊物的双重目标。它力图建立“善”的知识,这无疑既是对实证科学的挑战,也是对批判理论的挑战,但是《公共生活评论》仍然力图凸显这一方向。

这一学术刊物着重于三个方面的特征:

1. 关注基层社群,研讨公共生活

基层社群及其公共生活是本刊物关注的重点。中国的基层社群一方面虽已发生重要的改变;另一方面仍然有许多社群及其社会问题被主流所遗忘。在令人忧心的另一面,我们也发现许多行动者及其志愿组织在开展切实的行动力图改变。相关的集体行动在生产着新的公共空间,推动社区治理以及发展道路的转型。这本刊物侧重于社区导向的基层研究。通过社区事件的深度分析,反思和讨论社会的真问题。

2. 以行而求知,因知以进行

当代学院派的研究和实务界的行动存在着相当的距离,本刊物强调行动与研究的结合,希望填补学术和实务之间的沟壑,主张学术应该面

对时代问题，积极为社会建设服务；即立足于公共社会学的立场，将学术作为参与和影响公共生活的渠道，将对社会结构与社会转型的解释变为公共智识的工具。本刊一方面希望通过提供相关的评论和建议，使实务工作者也能通过阅读本刊物获得启发；另一方面，也希望通过行动人类学的参与性研究，使得学者能够和实务工作者一起直面社会问题，反思和推动自身的行动。

3. 认识社会转型，反思公民社会

中国正处于一个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这本刊物在关注基层社区的同时，也力求从社区出发，认识中国的社会转型过程、动力及其影响。而这其中，公民社会组织及其集体行动尤其被关注。这本刊物在强调行动和研究结合的同时，也强调对这一实践的反思和建设性批评。谋求公民社会在中国的良性发展。

以上三个特征展示了这本刊物的方向，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这本刊物着重于关注公民行动，并力图影响公共生活中最有行动力的人。

特别需要说明的是，这本刊物尤其支持致力于公共社会学和行动研究的中青年学者和学生。他们在这个变革时代里正在力图对当前社会科学脱离时代、臣服于权势的困境进行突破。在我们的教学实践过程中，我们发现有许多有相当创新意义的硕士或者博士论文，但是这些论文通常难得有发表的机会。本刊物将重点支持青年学者优秀研究成果的发表，进而推动社会科学新生力量的兴起及其学术的传承与创新。

我们尤其鼓励那些材料鲜活、观点明确、叙述生动的调查研究；鼓励调查者在田野调查中的社会参与；鼓励基于田野调查基础之上，在已有的或崭新的学术研究领域里的创新成果。

这就是这本刊物的梦想——它既不左，也不右，它要让自己站在变革的最前面，和这个时代共同呼吸。

目 录

卷首语·····	(1)
----------	-----

专题论文:

社会转型时期中国的空间现代性争议·····	张 鹏 (1)
集体行动的策略与文化框架的建构	
——对广州一个邻里的业主行动的案例研究 ···	朱健刚 王 超 (31)
加码的逻辑	
——B市业主诉讼维权的行动策略研究·····	孙湛宁 (71)

公共评论:

社会空间的三重奏:评《空间的生产》·····	朱健刚 (114)
社区建设的必要性与多样化前景·····	郭巍青 (124)
公民性、公民美德与公民社会·····	陈健民 (130)

对话:

转型社会学的学术原则·····	沈 原 (138)
社会转型与文化变迁需要民族志的洞察力·····	郭于华 (143)
社会转型逻辑与农民工现象·····	孙立平 (149)

调查报告：

香山山场：城中旧村改建与文物保护…………… 钟林春（153）

街头涂鸦

——一种空间再生产战术 …………… 梁雅茜（181）

译介：

社会正义，后现代主义和城市…………… 大卫·哈维著 黄菲译（213）

社会转型时期中国的 空间现代性争议

张 鹂

1999 年夏天，当我回到故乡昆明时，为了开展研究，并看望我的家庭，我父母——他们都曾长期居住在昆明，坚持带我去重访他们的婚礼地点——一所坐落在老昆明中心城区的茶馆。他们已经不去那里多年，但突然变得担心，怕由于近来为了城市更新而进行的大规模旧邻里拆迁，那座茶馆会不复存在。令我们高兴的是，这座建造优美的老四合院房子还在那里。抚摸着房子的木柱，我父亲，一位 70 多岁的大学退休教授，说：“我全都记起来了！那是一个简单的婚礼，现在站在这里，我能记得每件事。”他开始告诉我发生在 40 年前的婚礼细节——客人、音乐、食物和欢乐。然后他让我拍了尽可能多的照片，因为他害怕这个地方——铭刻他过去生活的一个物质见证——不久将消失。当周围的世界改变，他似乎想要依靠一些切实的事物来钩留他的记忆。我感觉到，他的怀旧之情远非一种琐碎的浪漫感伤，而是具有一种改变的力量，这种力量通过特定的空间创造了与过去的切实联系，“创造和维系着我们与历史的关系”（Seremetakis 1994, 3）。

昆明只是许多正在经历大规模拆迁老城区并草率地建设新城区以努力实现现代化的中国城市之一。城市本身也在快速向以前种植稻谷和蔬菜的周边农田地区扩张。高速增长已经永久性地改变了以往低矮的城市景观轮廓。古老狭窄的小巷和有着蓝黑屋脊的传统民居迅速消失，取而

代之的是今日中国强有力的现代性物质标志——多车道的林荫道，大型购物中心，高层建筑，豪华宾馆和灯红酒绿的娱乐中心。但空间和建筑的重构并不仅仅只反映近年来中国的社会经济变化，它们也改变了社会生活、地方政治和文化认同的模式。这些以进步和发展的名义进行的空间变革远远超越了环境建设的范围，它渗透到社会的各个方面。简而言之，城市规划——一种强大的社会变革手段——正在作为后毛泽东时期经济发展的关键策略被实施着。它也是展现不同意义上的社区和社会性的竞争舞台。

在这篇文章中，我在中国向高速增长的、商业化的消费社会变迁的语境下，考察了文化逻辑和社会转型时期空间重构的政治。^① 我具体分析了一项新的城市重建计划是如何导致了有着上百年历史的老内城邻里被破坏，以及成千上万的家庭是如何被重新安置的。我认为经济发展上的落后感与地方政府和房地产开发商形成的联盟势力相结合，正在重造后毛泽东时期的城市发展。同时，我试图理解普通人如何理解这种变化，和被重新安置的城市居民是如何顺应或挑战新的空间秩序的。我的研究揭示了一些常住居民和一些被剥夺了权利的市民批评近来的空间改造方式，通过利用某些空间作为其终老之地，甚至通过采取法律行动来对付政府与开发商，联合起来保卫他们的家园和他们在城市中的位置。这篇文章更大的目标是透过空间变革，加深我们对社会转型时期权力机制的理解。

我的研究定位在广阔的环境建设政治经济背景中，尤其是空间与权力的关系。在过去的几十年里，人类学家对理解空间的社会生产和文化意义，将空间放在多样化的语境中的兴趣一直在持续增加（参见 Rotenberg and McDonogh, 1993; Low and Lawrence-Zuniga, 2003）。^② 城市规划被广泛承认是一种社会控制和政治秩序的强有力的手段（参见 Holston, 1989; Rabinow, 1982、1989）。因此，我们不能视城市美学和

① 我认为中国是一个处于社会转型时期的国家，是因为它还忠守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但在经济、社会和文化领域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革。

② 对于建设环境和空间形式的研究回顾，可参见 Lawrence and Low (1990)。

空间形式为自然的或中立的物质现象，而是必须将它们作为社会和政治争斗的产物加以检视（参见 Davis, 1992; Massey, 1994; Soja, 1989; Tuan, 1977; Smart, 2001; Caldeira, 2000; Pellow, 1996; Tang, 2000）。在他对 Brasl'lia 城建的大力批判中，Holston (1989) 表明，这个巴西政府为促进国家发展和促进社会生活向一种想象的未来转变而建造的现代化的城市，最后终结于它的自相矛盾引起的各种颠覆之中。他对这个城市空间进退两难境地的分析，对于我们理解社会转型时期集中于土地使用和空间重构的城市政治也很有启发。^①

长期以来，城市规划和建筑设计对于构想和实现中国社会的未来，一直是一个关键性的竞技场。^② Bray's (2005) 对于社会主义单位体系起源的新颖研究，揭示了毛泽东时代积极追求苏联式的现代计划，以改变中国城市空间，实现社会主义治理和社会制度的新形式。后毛泽东时期的改革政权也希望通过一种根本不同的城市空间改组来推动社会经济变革。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随着土地使用权的商品化和房地产业的发展，这种张力被强化了。中国城市能够在何种程度上维持它们独特的文化传统的同时，完成向现代大都会的转型？对于它们来说，采取一种二元论方法，使传统和现代的空间形式不被当作对立面而是当作相互构成的因素，以此来允许一个地方既获得经济上的发展，而又能保持其（文化上的）独特性是可能的吗？这些都是当今中国城市面临的挑战性问题。

在许多方面，中国的情形与那些在大量文献中记载的欧洲、拉美和北美内城更新及城市改造具有相似性（参见 Mollenkopf, 1983; Greer, 1965; Palen and London, 1984; Fainstein et al, 1983; Logan and Molotch, 1987）。昆明的案例提供的不是它的新颖性，而是它的紧迫性、固有的激进主义以及缺乏有组织的市民回应。^③ 这三个特征都与落后联

① 我绝不是第一个分析中国的空间重要性的（参见 Davis et al., 1995; Rofel, 1999; Smart, 2001; and, for early twentieth-century China, Dong, 2004; Esherik, 2000; Lu, 1999）。

② 危险的并不仅仅是传统和现代之间的冲突，40 年的社会主义经历和市场改革时期国家权力的持续凸显，使中国人对于空间和地点以及他们对于现代性的观点复杂化了。

③ 我特别感谢评审员们力劝我在完整的论述中考虑这些特征。

系在一起，关于这一点我想进一步说明。

首先，我的研究检视“迟到”感或经济发展和现代化的落后是如何转化到城市空间改造上的。换句话说，对“现代”的追求与对“落后”的反感，日益表露在对传统都市景观的反对，及对毛泽东时代被引进的苏联式空间现代性的城市规划的抵制。昆明经历了一种双重意义上的落后，因为它不仅需要赶上西方世界，也要赶上国内更为发达的沿海地区，尤其是经济带和中国开放较早、最先从改革获益的主要大都会地区。几十年来，昆明一直被中心地带和沿海地区的人们看作偏远的、欠发达的、变化缓慢的边境城市。对于落后的焦虑，和希望从经济上和表征上迎头赶上的愿望，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当地政府拆除被认为与服务产业和大众消费的新经济不相容的旧基础设施的决定。在这种背景下，构建一种新的城市景观被认为是重构一个世界性的、先进的新昆明的关键组成部分。与逐步更新的策略相比，例如革新或修复，当地政府更愿意采取激进的方式来加快这一转变，其中包括进行大规模的旧城和街道模式拆除。

其次，落后的概念突现了中国城市改造政治塑形的独特历史时刻。虽然市场力量迅速扩张，但国家在某些领域，例如城市规划和土地配置方面，还是保持着支配性。这是由于，大多数城市重建和居民重新安置能够被迅速实施，都与国家控制土地所有权有关。尽管在许多社会和经济领域发生了私有化，但国家依然是城市土地的唯一合法所有者（国有或全民所有）。^① 自 20 世纪 80 年代后期以来，土地使用权方面已经发生了一些重要的变化。虽然个人或企业（例如单位或私人开发商）不被允许拥有或交易土地，但他们现在不同程度地被赋予了土地使用权，并且能在市场上转让这种权利。^② 土地使用权的商品化促使房地产市场繁荣，但它也使财产所有权成为一个复杂的话题。例如，一个市民可能拥有一座住宅，但却不能拥有住宅建于其上的土地的所有权。由于使用权

① 大部分农村和郊区的农田是集体所有的。

② 参见 Hsing (n. d.) 关于中国土地政治的详细阐述，尤其是关于各种行动者之间复杂的协商谈判（如，不同级别的政府，开发商，单位，单个的城市居民和郊区农民）。

相对于所有权是第二位的，因此当在城市改建中发生利益冲突时，普通居民常常处于国家的支配之下，国家对有争议的土地用来做什么具有最终决定权。

再次，社会转型时期以当地政府和房地产联合形成的强势发展为特征。通过土地开发和再开发，官员和开发商能够以普通城市居民的利益为代价，积累政治资本和财政收益（参见 Zhang T.，2002）。刺激政府官员推动城市改造的动力非常巨大。随着财政的非集中化，当地政府在决定土地使用和经济发展方面获得了更多的自主权，但是，他们也不得不自己负责获得收入。将城市和郊区土地的使用权卖给开发商的经纪人（参见 Fang and Zhang，2003），成为一种新的地方财政策略。交易时收取的大笔土地使用费，使得当地政府能够迅速聚集大量现金，来投资其他项目。在过去的社会主义鼎盛时期，对党的忠诚和意识形态斗争是政治资本的基础，但是在当今，经济成就和将城市转变为世界性中心的能力，在政治提升中被更为看重。因此近年来城市空间重建的根本动因，不仅要从空间现代性的文化逻辑上来解释，而且也要从政治资本和声望的积累上来解释。

通过聚焦于中国的“落后”政治和其空间表达，本文表明了一种对现代性和发展进行文化和历史的重新思考的独特方式。一些学者将现代性的关键特征定位于主要是人类的时间经历和历史意识的深刻转变（参见 Habermas，1987；Dirks，1990），但另一些学者则揭示了另一个关键方面——人们的空间经历和空间意识的深度割裂，这种割裂经常导致一种激进的地方性、社会关系和权力几何学的重构（参见 Appadurai，1996；Mitchell，1991；Miller，1994；Massey，1994；Soja，1989）。Daniel Bell（1978）曾对现代主义和资本主义发展中的空间的重要性（相对于时间问题）进行过有说服力的辩论（参见 Lefebvre，1991；Harvey，1990）。Marshall Berman 的 *All That Is Solid Melts into Air*（1998）很好地捕捉到了这种现代空间割裂的势不可当的感觉。空间、社会和历史之间的相互关系在 Lefebvre's（1991）“城市问题”概念、Soja's（2000）的“城市空间”观点和其他一些论著中得到了清晰表述。二者对充满张力和竞争力的时空重构进程作了描述，并将我们的注

意力放到了现代性的空间特征上。简而言之，时间和空间决不是分裂的，相反，它们在人们的现代性和后现代性经历中是一体的。

我对于中国通过空间重构追求现代化的说明，试图精确地描述空间和时间是如何在一个特定的社会主义时刻相互塑造的。这一点是通过分析一个地方在发展度量上的位置，诸如“进步”和“落伍”，“现代”和“落后”，是如何影响其城市空间的重建的。在商业发展和对赶上“现代”世界的向往中，根深蒂固的落后感构成了重铸中国城市景观的部分根本原因。

这篇文章中的民族志资料，来源于 12 个月的田野工作，这些田野工作是为一个更大的，揭示中国当前房产私人化和房地产业发展中的空间、社会和政治之间盘根错节的关系的项目而做的。田野工作在 2000 年至 2004 年间的 5 个夏天进行。由于我在昆明长大，而且几乎每年都要回来拜访，因此，我见证了跨越较长时间的空间变化，并对当地社会、政治机制和文化情感变迁有较深的认识。本研究将采用的田野方法与长期对这个城市的空间和社会的参与观察，对 12 位城市官员、规划者和发展商以及 28 位城市居民的开放式访谈，和对政府文件和新闻报道的文献研究结合在一起。^① 访谈对象的年龄从 17 岁到 75 岁不等。男性被访者超过半数。这些居民在职业上可以粗略地被分为教授、小学教师、医生、大公司的经理、个体户（如店主和出租车司机）以及在收支相抵中挣扎的人们，包括退休的工人和近来的下岗工人等。其中两人是高校学生。访问时间通常在一个半小时至两小时之间。^②

重建昆明

昆明坐落于中国西南的云贵高原，是云南省的省会，2000 年，中

① 这些数字只包括我为了这部分的研究而访谈的人数，而不是整个大项目全部被访谈者的数量。

② 所有被访者都用的是假名。

心城区户籍人口约为 150 万。^① 这座建于 1000 年前的城市，在过去的 20 年里经历了巨大的社会和空间变化。^② 历史上，昆明通过建于 1910 年的滇越铁路与整个东南亚地区有过频繁的接触，但它与中国其他地区的接触却很有限。^③ 几十年来，整个云南省都被视为与现代性绝缘——一个云之南端的地方（如同“云南”一词的含义）。

在 1978 年改革开放以前，烟草业是当地经济的支柱，但改革为这一地区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在烟草生产继续保持着重要性的同时，旅游、贸易和服务行业也成为经济增长的动力。一个扩张的铁路、国际公路和改良的空中运输系统现在直接将昆明与中国和东南亚的其他城市联系了起来。而且，由于它丰富的历史遗产和多元化的族群，这个省吸引了上百万旅客来寻访一个具有异国情调的“老中国”。^④ “消费革命”（Davis 2000）的出现，导致了新的商业、旅游和服务业，这使得城市中需要越来越多的旅馆、商店、餐厅、银行、办公楼和住宅。这种繁荣，从周边乡村地区和其他省份吸引了成千上万的移民工人和小商贩来到这个城市。与此同时，城市贫民（主要是低收入家庭和下岗工人）和新贵（主要是私营企业主和商人），以及农民工和正式的城市户籍人口之间的社会分化显著增加（参见 Zhang, 2002）。利益群体之间出现了多重张力，其中之一就是历史遗址保护和商业发展之间的冲突。

昆明是 1982 年被国家委员会指定的 24 个“历史文化名城”之一。这种空间地位，在城市将自身作为有吸引力的旅游目的地市场化的过程中，赋予了一个城市显著的优势，而且这一举动也反映了国家对于许多由于对经济发展和现代化的盲目追求而处于危险之中的历史遗址的关注在增加。随着对城市土地的竞争日益激烈，大规模的旧城改造和城市空间重构开始发生在中国大多数城市。在新的规划下（1993—2010），昆

① 昆明市的总人口（包括辖区范围内的外围地区和农村）约 450 万。

② 一些学者认为昆明作为一个城市中心是在 8 世纪起源的（参见 He and Qing, 1999）

③ 它的孤立是由于极其不发达的地面运输（参见 Skinner, 1997）。

④ 云南有 25 个少数民族。另一个吸引众多游客的是昆明四季如春的宜人气候，这一点反映在它被称为“春城”上。

明大部分百年以上的老城区被系统地拆毁，代之以多车道的林荫道，宏伟的购物中心，商业高层建筑和奢华的住宅区。拆迁在 1996 年至 1998 年间达到顶峰，当时这个城市在筹备举行 1999 年的世界园艺博览会。当地政府将世博会看作促进旅游、商贸和外国投资的难得机会，大力投资房地产建设。在不到三年的时间里，花费在这类项目上的总投资超过了原先包括下一个十年的预算。^① 在 1999 年的一次讲话中，张成寅市长强调了旨在将昆明变为一个现代化的地区经济中心的“城市形象工程”的重要性：“通过新面貌和高质量的服务重建昆明，是向世界展示我们的经济成就和向前看、开放精神的关键途径。”

解构总体规划

中国城市空间的叙述大多被置于进步、发展和现代化的宏大叙事中。在这些叙事中，过去经常仅被认为是将来的一种铺垫，是一些最终会过时的事物。^② 根据这种思考方式，历史变化是一个对过去持续否定的过程，这样新的和更好的才能在破坏的基础上被建设。这种历史行进的线性观点，以及成为现代的欲望，共同形成了在改革政体下构思城市空间的范式。^③ 根据这种发展叙事，旧的城市景观不能再满足社会现代化和商业化的新要求，因此在实体上和象征意义上成为发展和进步的障碍。

昆明的城市总体规划，提供了一个发展和历史进步的宏大叙事塑造当下的城市重建的引人注目的例子。这份规划旨在“重新定义昆明的性质，以设置新形势下城市发展的适当目标”。在这份长达 17 个章节的规划书中，第一章指出了昆明的三个关键方面：（1）它是省会城市，因此

① 世博会期间，昆明接待了上百万游客，昆明市和云南省获得了大量收入，当地商业也被大大带动。然而，从那时起，许多高级酒店就一直空着——这就是过度发展的后果。

② 类似的描述遍及全世界，参见 Blomley 有关加拿大房地产的发展（2002）。

③ 这种历史线性思维不是中国这一历史时期的特殊产物，而是进化论和中国式思维的一部分（参见 Duara, 1995）。

是西南地区的政治和行政中心。(2) 它是一个有着丰富文化和历史传统的历史文化名城。(3) 它应该通过旅游、商业和贸易资本被迅速地发展为一个国际商业中心。第三方面是被进一步详细阐述的重点。一种对于在发展中落后和迎头赶上的急迫感在这一公开的章节中被明确表述如下：“到 2020 年，昆明应该在社会、经济和技术能力方面进入国家先进城市之列……这一计划将为昆明在 21 世纪中期向先进的国际化都市转变奠定基础。”尽管第 7 章对于历史文化遗址保护提出了一些基本观点，但它趋向于将焦点集中于公园、风景点和历史事物的再生产（例如塔、大门、寺庙和牌坊），而在很大程度上忽略了传统的居民/商业区——活生生的历史空间。它顺便提及了几处传统城区，但完全忽视了如何保护和修复这些富有特色的城区的问题。在本质上，这一新规划是一个以商业发展为前提的发展蓝图。其余的章节主要是在描述昆明在基础设施各个方面的现代化，和为商业发展、旅游及大众消费开辟更多空间。^① 当城市土地开始变得稀缺，和为世博会开展的建设在 20 世纪 90 年代后期加速的时候，即使在这个规划中被划归为保护对象的城区也开始成为拆迁对象。

直到 20 世纪 80 年代早期，昆明还有很多老街和老居民区。^② 在这些城区，房屋沿街而立，并彼此相连。商业带和居住带之间没有明确的空间区分。一所典型的老房子是一座两层或三层结构，有着木质墙面和灰色屋脊的建筑。靠近地面一层的房间面向街道，通常被用作店面，而其他房间则作为住处。20 世纪 80 年代开始了缓慢的老城区的拆迁和街道扩充，但 90 年代中期则变成了系统的、大规模的拆迁。仅仅在世博会举办前的三年内，90% 以上的老城区被拆毁，成千上万的老居民被迫出城。一名高校老师向我描述了他 1997 年 11 月见证的一次主要拆迁：

① 这类决定通常都会被最大限度和最好地利用土地的基本原理而影响（参见 Derbes, 1981; Blomley, 2002）。

② “传统的”和“老的”一词，通常被用来指建于 20 世纪早期的城区和街道，以及它们独特的风格和材质。社会主义政权建立后，很大程度上受苏联城市规划和建筑所影响，中国的建筑结构具有了一种不同的外观（参见 Bray, 2005; Buchli, 1999; Bater, 1980）。

我的朋友和我去看武成路和金碧路拆迁，这是两条主街道和最大的传统商业及居住区。甚至当我们还在离那个地方很远的时候，我们就能看见空气中到处飞扬的尘土。当我们到达那里的时候，我看到房子一间连一间倒在地上。那种场面真是难以置信。你知道，其中的一些房子有着雕刻和描绘得非常精美的木梁、窗棂和门面。一些人冲进去，试图拖出一些碎片来。你可以用很少的钱买到它们。现在它们被当作古董，因为已经很难再找到了。

由于以城市现代化和商业增长为名义被认为是正当的，因此这一时期的拆迁规模大于以往任何时候。到1999年中期，昆明看上去已经与过去很不一样了。老居民区被大银行、酒店、百货公司和商业广场所取代。街道被拓宽，改变路线，重新命名，或者完全重建。许多常住居民告诉我，他们都认不出附近的道路了。官方及媒体将这种重建当作向城市现代化前进了一大步来庆祝，市政府和省政府不再是唯一表达这种狂热的单位。年轻人和上升的中产阶级也欣赏这种现代化的空间景观，并为此感到自豪。他们成长于一个被媒体、网络和新娱乐业所控制的年代，这些媒体、网络和娱乐业经常提供诸如摩天大楼、高速公路、超市和西式别墅的形象。这些形象是他们对于现代想象的主要来源。而且，新中产阶级的成员也是那些直接从城市经济发展中受益的人，这种发展提供给他们奢华的市区住宅、购物机会和私家车道路。

当国务院宣布所有官方指定的“历史文化名城”将被检查和重新评估时，这种大规模的重建在2000年夏天突然放慢了。^①如果一个城市没能保护其历史遗址和建筑，它的特殊头衔将立即被取消。这一公告是对媒体报道中地方上滥用遗址的反应，并且也是对国际遗产机构，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指出的有关问题的反应。许多地区的地方政府开始恐

^① 从1982年起，国务院增加了99个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并要求它们采取保护措施。